

姑苏道士席应珍考略

郑永华

元末明初的姑苏道士席应珍博通三教，与明代著名“缙衣宰相”姚广孝有长期而密切的交往，并对后者产生了积极影响。这是宋元以来中国儒、释、道文化交融发展的典型事例，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独特意义。利用姚广孝所撰《海虞席先生墓铭》等原始资料，可以对席应珍的籍贯名姓、师承法嗣、住持宫观、治学修为，以及其与姚广孝的关系等问题，进行较为详细的考辨。

关键词：席应珍 生平 道士 姚广孝

作者：郑永华，1968年生，历史学博士、宗教学博士后，北京社科院历史所副研究员。

明清笔记多记载明初著名僧人姚广孝曾从一位名叫席应珍（或作“席应真”）的道士求教兵法术数，这一说法后来还载入《明史》，产生了广泛影响。姚广孝在明初政治、军事、宗教、文学、科技诸方面都有很大成就，尤以辅佐燕王朱棣夺取帝位而名垂史册，后又拜为两代帝王之师，极大地影响了明代的政治走向，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“缙衣宰相”。姚广孝与道士席应珍的密切交往，是宋元以来中国儒、释、道文化交融发展的典型事例，在中国道教史上具有独特意义。但关于席应珍这位在明代道教史上应有一席之地的高道，不仅概述性的中国道教通史中未见记载，相对详细的断代著述亦罕有提及，使其俨然成为神秘莫测的世外异人。究其原因，与目前尚缺乏对席应珍的专题探讨有很大关系。^①今检索史料，对其生平事迹略作考述，以昭史信。

一、有关史料记载

明清关于席应珍的记载，多在叙述姚广孝时涉及，专传其本人者，以正德年间的《姑苏志》较早，略云：

席应珍，字心斋，号子阳子，常熟人。少辞家学老氏法，真籙丹法，靡不洞晓。兼涉儒籍，尤邃于《易》，释典方术，咸能旁通。奉其母甚，至葬祭，痛哭如初。或谓“亲爱既割，何得徇礼若是过与？”应珍曰：“吾法当割爱人道，然世间岂有不孝之神仙也哉？！”始

^① 道教通史如李养正《道教概说》（中华书局，2001）、卿希泰主编《中国道教史》（四川人民出版社，1996）、任继愈主编《中国道教史》（增订本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2001），专题著述如张继禹《天师道史略》（华文出版社，1990）、王志忠《明清全真教论稿》（巴蜀书社，2000）等，均未提及席应真与姚广孝的关系。关于席应珍（席应真）的专门研究，以学术期刊网、百度、Google等常用工具进行检索，皆未发现相关篇目。

提点常熟普福宫，迁郡之白鹤及相城灵应宫，洪武中卒。^①

至明末清初钱谦益编纂《列朝诗集》时，辑“子阳子席应真”小传称：

应真，字心斋，号子阳子，海虞人。年未冠入道，提举虞山之致道观。真经秘录，靡不洞晓。兼读儒书，于《易》尤邃。尝居相城灵应观，与沙门道衍为忘形交，道衍师事之。衍公即姚少师广孝。或云少师兵法，半是心斋所传也。洪武十四年三月卒，年八十一。^②

正德《姑苏志》与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叙述，在后世影响颇大^③。但其内容简略，距传主年代也都有较长时间，其中或难免增衍与附会。与此相比，明隆庆庚午年（1570）编成的张昶《吴中人物志》，关于席应珍的叙述即更为详细和准确，却一直未引起研究者的注意，其文称：

席应珍，字心斋，号子阳子，常熟沙头人。年未冠即辞家学老氏法，兼读儒书，尤邃于《易》，至于释典方术之道，悉能通焉。孝于母，滫瀡温清之奉勿少怠，死葬如礼，春秋礼享，痛泣如初丧。或谓“亲爱既割，何得徇礼若是之过耶？”应珍曰：“吾法当割爱入道，然世间岂有不孝之神仙也哉？！”应珍始提点致道观，后迁郡之白鹤。及居相城灵应宫，一坐二十余年，兵后能中兴其业。洪武十四年三月十日卒，年八十一。沙门道衍多得其传，尝为葬铭。^④

张昶提及的葬铭，乃是席应珍辞世后不久，与其交往密切的道衍禅师亦即元末明初著名僧人姚广孝所撰，全名《海虞席先生墓铭》，后收入《逃虚类稿》。《珊瑚木难》亦有刊录，惟个别辞句不同，或是据碑刻而来，对姚广孝原文有所修改。这是关于席应珍生平最详细、也最权威的第一手史料，前人迄未引用。现对照全录如下，其中《珊瑚木难》（简称《木难》）不同或有误者，随处注明，以便于研究者参考：

席氏之系，出于晋大夫籍谈之后，裔孙环避楚项羽之名，改籍为席。汉唐以来，其族渐蕃（“蕃”误，《木难》作“蕃”），散落诸郡。及宋有讳汝言（“汝言”，《木难》误作“汶言”）者，官至尚书司封郎中，致仕，与文潞公、富郑公辈为耆英会。席氏至尚书公始著，先生实出其后。父某、大父某、曾大父某俱潜德弗振，世居海虞，故先生为海虞人也。先生名德珍（“德珍”，《木难》作“应珍”），字心斋，年已（“已”，《木难》作“未”）冠即辞庭闹，入乡之某院，从某习老子法。先生性端诚，好学不苟，略于真经秘策、醮章丹法，靡不洞究，兼读儒者书，于《易》尤邃，至于释氏之（《木难》多一“大”）法，术家之小道，悉能通焉。先生孝于母，滫瀡温清之奉勿少怠，死葬如礼，春秋祀享，其痛泣若新丧。或谓之曰：“先生亲爱既割矣，何得徇世礼若是之过耶？”先生曰：“謏（“謏”，《木难》缺），吾法当割爱入道，然世间岂有不孝之神仙也哉？！”于是咸（“咸”，《木难》误作

①（明）林世远、王鏊等纂修：正德《姑苏志》卷五十八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7辑，书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，第925页。

②（清）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闰集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第675页。亦见于《列朝诗集》，惟其名作“席应珍”。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十一册，第6175页。

③如明代马倬重建灵应宫碑记（民国《相城小志》卷二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华中地方第412号，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81-82页；又参见黄翔《访〈灵应碑〉记》，<http://blog.sina.com.cn/s/blog-61cf0620100h1wt.html>），以及清代时宝臣《双凤里志》卷四“席应真传”（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乡镇志专辑（9），南京：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9页），均为综合《姑苏志》、《列朝诗集小传》等而来。

④（明）张昶《吴中人物志》卷十一。清代四库馆臣谓其书较王宾、杨循吉、祝允明、朱存理等撰述为备，“然事皆不著出典，未免无征不信”，或嫌苛责。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史部第97册，齐鲁书社1996年版第771页、第801页。

“或”)可其言。先生友于兄弟,睦于宗戚,和于乡党,接物之际,温温如春风袭人,故髯文(“文”误,《木难》作“丈”)韶童皆知敬爱。先生始出则提点海虞之某观,次迁苏城(“城”,《木难》缺)之白鹤、相(“相”,《木难》误作“桐”)川之灵应,(《木难》多一“皆”)有治绩。惟灵应一坐二十余稔,兵后能中兴其业,人咸誉之也。呜呼,先生守(“守”,《木难》作“习”)其教而勿泥(“勿泥”,《木难》作“弗沉”)也,故能博究儒释诸家之书;割其爱而弗固也,故能奉于亲,尽生事葬祭之礼;洁其身而弗我也,故能协于兄弟宗戚乡党之情。弗泥也,弗固也,弗我也(从“故能协于兄弟”至此凡21字,《木难》缺),岂非古之有道之士者欤?!先生世(“世”,《木难》作“老”)寿八十有一,号子阳子,洪武十四年三月十日以疾卒。火既化,函其骨,瘞(“瘞”,《木难》作“葬”)于某山之阳(“阳”,《木难》作“原”)。弟子二人(“二人”,《木难》缺),陈某、陆嗣源。嗣源,先生之外孙也。同郡沙门道衍与先生为忘形友,故敢掇其梗概,以志于墓。铭曰:席之昔,晋谈出。避项讳,籍作席。族巨藩(“族巨藩”,《木难》作“子姓蕃”),宗德积。尚书公,氏始硕(“始硕”,《木难》作“惟赫”)。惟先生,裔乃的。从黄老,勿泥迹(“勿泥迹”,《木难》作“弗沉溺”)。究诸子,贯儒释。了至道,邃于《易》。奉厥亲,敬匪色。葬与祭,痛而泣。致孝问(“问”,《木难》作“闻”),震里域。和尔乡,睦尔戚。观领三,寿八十。岁辛酉,疾乃卒。化于火,函其骨。卜某山,竟窆窆。衍作铭,勒贞石。俾玄风,遗无极。^①

据此可对其生平事迹稍加勾勒,并纠正明清文献记载之误。现将几个相关问题,分别考述如次。

二、几个问题的考辨

(一) 姓名与籍贯

明代以来,一直有“席应真”、“席应珍”两种不同写法,至今未得辨析。追溯其源,正德《姑苏志》即有“席应珍”与“席应真”两种写法。^②这种异名并存的情况持续相沿,其中“席应珍”见于《留青日札》^③、《罪惟录》^④及《明诗综诗话》^⑤等,“席应真”则为王世贞^⑥、过庭训^⑦、王鏊^⑧等沿用。明末钱谦益编纂《列朝诗集》时,诗作及随附小传均署“(席)应珍”,而单独辑出的《列朝诗集小传》则作“(席)应真”。入清后,《明史》称姚广孝“事道士席应真,

① (明)姚广孝《海虞席先生墓铭》,《逃虚类稿》卷二。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8册,第103-104页。

(明)朱存理《珊瑚木难》卷六,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子部第815册,第204-205页。

② 正德《姑苏志》,其中“席应珍”之名见于卷二十九、卷五十八,“席应真”之写法则见于卷三十、卷五十二。分别见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6-27辑,第428、925页与第460、810页。

③ (明)田艺蘅《留青日札》卷二十七。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892页。

④ (清)查继佐《罪惟录》列传十六。浙江古籍出版社版第四册,第2233页。

⑤ (清)朱彝尊《明诗综诗话》不分卷,《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》第十六册,中华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9年版第774页。

⑥ (明)王世贞《弇州山人续稿》卷一百四十六。《明代传记丛刊》,台湾明文书局印行第154册,第611页。文称姚广孝“虽以方外名,而内劲侠,有道士席应真者,精兵家言,与公邻寓,奇公而密授之”。

⑦ (明)过庭训《本朝分省人物考》卷十八“时相城灵应观道士席应真者,读书学道,兼通兵家言,尤深于机事。广孝从之,执弟子礼,于是尽得其学”。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史部第60册,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554页。又见《明代传记丛刊》第130册,第631页。

⑧ (明)王鏊《姚广孝传》。朱大韶编《皇明名臣墓铭》,《明代传记丛刊》第58册,第61页。

得其阴阳术数之学”^①，“席应真”的说法开始占据主导地位，“席应珍”之名渐隐而不显。故后来方志作“席应珍”时，又特意注明此前“《合志》作（应）真”，文中更径用“应真”之称，谓“应真主佑圣道院，见班惟志碑”云。^②

前引姚广孝所撰墓铭，《珊瑚木难》作“先生名应珍”，抄本“先生名德珍”或属笔误，张昶即记为“席应珍”。再检索资料，今常熟徐市镇李塘佑圣道院大殿东壁，有元顺帝至元四年所立《常熟州东李塘右（佑）圣道院之记》碑，碑文 17 行，每行 35 字，末署“通玄明素弘道法师本院住持席应珍立石”。^③又现存姚德厚画作《秋林渔隐图》，亦有落款为“席应珍”的题诗云“独把长竿江水湄，满船山色映涟漪。羡渠不入非熊梦，千古清风一钓丝”。^④这两条史料均由本人亲书，一为道观碑刻，一为友人书画，足证其名当为“席应珍”，后世盛传的“席应真”应为异名，也可能是他人误书。其原因或缘于席应珍为修真高道，以同音而讹写。清代以来的流行，则与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及《明史》有关。故本文以“席应珍”为正名，因行文需要方兼用后出的“席应真”之称。

关于席应珍的籍贯，钱谦益作“海虞人”，姚广孝更明确称其上三代“世居海虞，故先生为海虞人也”。海虞为常熟古称，故明《姑苏志》径称席应珍为“常熟人”，在“方外”中有“席应珍”之条。但嘉靖《常熟县志》未辑录席应珍事迹，其后的常熟方志也少见记载。这种情形可能与明中期太仓州的析置有关。关于席应珍乡贯具体地址，《吴中人物志》记为“常熟沙头”，地方小志《双凤里志》等亦收录“席应真”其人，可为佐证。沙头又名沙溪，在今太仓市沙溪镇。“沙头，沙之头也”，父老相传其地原为海，后逐渐繁盛，元末属常熟双凤乡三十九都，“民居市物可埒双凤”。沙头位于常熟县东界，“距常熟县治东南八十里余”。^⑤弘治十年（1497）从常熟析出双凤乡，加上昆山三乡与嘉定两乡新设太仓州^⑥。此后沙头不再隶于常熟县。明代《吴中人物志》谓席应珍为“常熟沙头人”，已属不确。清代朱彝尊等随沿袭明初文献，误称席应珍为“常熟人”^⑦。今人以席应真为常熟人，亦为文献相沿之误。

或许与明中期的政区变更有关，后来常熟和太仓的方志中均少见关于席应珍及其家族的记载。我们仅能从姚广孝所撰墓志中，得知席氏前辈中，有席汝言一人在宋代官至尚书司封郎中，致仕后“与文潞公、富郑公辈为耆英会”。席汝言（1006—？）字君从，宋神宗元丰五年（1082）正月与司马光、富弼、文彦博等在洛阳作耆英会，各赋诗纪盛，席诗云“系国安危唐上宰，功成身退汉留侯。二公闲暇开高宴，九老雍容奉胜流”，又云“壮岁尘埃禄事牵，老归重到旧林

①（清）张廷玉等《明史》卷一百四十五。百衲本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84 页。

②（清）顾崇善纂《里睦小志》卷下。沈秋农、曹培根主编《常熟乡镇旧志集成》，广陵书社 2007 年版第 611 页。其实文中所涉及的“班惟志碑”署作“席应珍”，而非“席应真”。碑文内容，参见同书第 643 页、第 667 页。

③（清）顾崇善纂《里睦小志》卷下，又见（民国）程心龛辑《里睦小志艺文志补》。《常熟乡镇旧志集成》，第 643、667 页。

④ <http://www.cchicc.com/photo.php?id=98343>。然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、顾嗣立《元诗选》，均未录入席应珍此诗。

⑤（清）曹焯《沙头里志》卷一（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乡镇志专辑（8），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35 页）、弘治《太仓州志》卷十下（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》第 3 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第 349 页）、嘉靖《太仓州志》卷五（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》第 20 辑，据崇祯二年重刻本影印，上海书店 1990 年版第 364 页）。

⑥《太仓县志》，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8、71 页。

⑦（清）朱彝尊《明诗综诗话》不分卷。《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》第十六册，第 774 页。

泉。曾无勋业书青史，偶向康宁养老年”^①。宋代洛阳耆英会轰动一时，席氏家庭此后也开始繁盛。姚广孝称席应珍为席汝言一支嫡裔，但自其曾祖父起即“俱潜德弗振”，意味着席应珍上三代均为平民百姓，未任一官半职。史称沙头“民乐耕桑，富室亦多，好事士，习经书，科甲代不乏人”^②。席应珍出家为道之举，与其家庭贫弱是否有关，未见于史乘，有待考察。

（二）出家时间、地点及师承法嗣

席应珍出家时间，《姑苏志》笼统作“少辞家”，《吴中人物志》谓“年未冠，即辞家学老氏法”，钱谦益称“年未冠入道”，其意相同，均源于姚广孝所记“年未冠即辞庭闱，入乡之某院，从某习老子法”（《逃虚类稿》抄本作“年已冠即辞庭闱”，当属笔误）。又有文献说席应珍“髫年即辞家学老氏”^③，髫年，泛指幼年，或说为小孩七八岁换齿之龄。前引两说含糊其词，或说明席应珍很早即仰慕道教，并出家于乡中道院学习道法。古时男子20岁左右行冠礼，席应珍病逝于明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，寿八十一，则其生于元成宗大德五年（1301）。按20岁加冠推算，席应珍辞亲入道当在元英宗至治元年（1321）之前，具体年份则未见于史料。

席应珍出家之地与随从之师，姚广孝含糊作“入乡之某院，从某习老子法”，略而未书。席应珍乡贯所在沙头镇，有延真道院，原在涂松，元至元辛巳（十八年，1281）为道士王士伦改筑于原地以西五里的沙头之北。后有葛善信、高善性师兄弟相继主之，“翻完门闾，新好廊殿”。延真道院居中奉玄天上帝，西奉青宫神者，东祀天中大神，“遂成一方士民祷祈之所”，“代有增益，壮丽甲于东南”，名动乡里。^④此外又有延禧万寿观，在沙溪南戚浦之阳实，延祐五年（1318）为“乡大姓盛景韩氏创”，传茅山四十四代宗师王道孟之法。^⑤沙头所在的双凤乡，还有著名的普福宫，时由周应灵主持。可能还有其他失载的小道观。由于资料匮乏，难以明确席应珍最初出家之所。

关于席应珍的师承，《姑苏志》提到“白鹤观，……元平江路总管张世昌舍宅建，初名报恩道院。寻废，道人张应玄复建。有群鹤自东南来，一鹤结巢树上，每晨鸣则得檀施，因名白鹤观。应玄弟子席应珍主之。”^⑥元高德基所撰《平江记事》为其史源，详述原委称：

白鹤观，在吴城东北隅鹤舞桥之东，宋信安郡王藏春园地。至元间，草石荒凉，井旁大松树独存。云游道人张应玄初来，结屋松树下以栖身。丁丑三月朔，有群鹤自东南来，徘徊久之。一白鹤留松上不去，经岁作巢，广若酒家七石缸。性若灵异，清晨俛首长鸣日，必有大檀越至。候之以为常，预备斋供以待。士众皈依，喜舍云集。应玄更为应鹤，欲创立道观，以焚修不久物故，弟子集〔席〕应真承其业，缘募十方，卒成其事。观成，鹤乃飞去，遂名为白鹤观。^⑦

由此可知，席应珍之师名张应玄，他先在常熟双凤乡中道院收席应珍为徒，后云游到郡城平江（即苏州），以白鹤来其栖身之松树下，更名应鹤，欲兴建道观，物故后由弟子席应珍实现遗

①（宋）席汝言《耆英会》，傅璇琮等主编《全宋诗》卷二百七十二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五册，第3466—3467页。

②弘治《太仓州志》卷一。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》第3册，第38页。

③（明）张岱《快园道古》卷一，杭州：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5页。

④（元）俞焯《延真道院记》，弘治《太仓州志》卷十下（《日本藏中国罕见地方志丛刊续编》第3册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第347页）、嘉靖《太仓州志》卷十（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》第20辑，第711页）；以及明代林复真与沈鲁所撰的重修碑记《沙头里志》卷三，第550—552页。

⑤（元）俞焯《延禧万寿观记》，《沙头里志》卷三，第550页。又嘉靖《太仓州志》卷十。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》第20辑，第709页。

⑥正德《姑苏志》卷二十九。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6辑，第428页。

⑦（元）高德基《平江记事》。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史部第590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467页。

志。张应玄其人未见于其他史志，是一位少为人知的道士。席应珍法嗣亦不兴盛，一生仅收陈某及外孙陆嗣源两人，再传亦不见于记载。席应珍嗣法传承，可简略排列如下：

张应玄（应鹤） | —— 席应珍（应真） | —— 陈某
| —— 陆嗣源（席应珍外孙）

（三）主持致道观的问题

席应珍一生主持道观三座，其中后两座——苏州白鹤观、相城灵应宫迄无疑义，但对于初领道观，则记载各不相同。比较普遍的说法是，席应珍来苏州白鹤观前所领者，为常熟致道观。张昶说席应珍“始提点致道观，继迁郡之白鹤，及居相城灵应宫”，钱谦益也说他“提举虞山之致道观”，朱彝尊相沿称“应珍，……提举致道观”。^①直至民国年间的《相城小志》，仍称席应珍“始提点常熟至（致）道观，迁郡之白鹤观及相城灵应宫”。^②席应珍主持常熟致道观的说法，自明中叶以来，几乎成为共识。

致道观在常熟县治之西一里，地处虞山之阳，旧名乾元宫，梁天监二年（503），相传为天师十二代裔孙的张道裕开始筑观，号曰“招真治”，后成为常熟境内道教胜地。宋宣和七年（1125）敕赐“致道观”，名声更著。致道观门临通衢，上书“虞山福地”，观内规制峻整，梁简文帝所赐玉牒与钟、紫微殿后丹井、广庭内七星桧等道迹古物，皆知名内外。^③致道观的声望与名气在白鹤观和灵应宫之上，故钱谦益、朱彝尊均只记席“提点致道观”，不再提及白鹤、灵应。但姚广孝所撰墓铭总结席应珍一生“观领三”时，仅说到“先生始出则提点海虞之某观，次迁苏城之白鹤、相川之灵应”，对其初领道观并未指明。这是姚广孝不清楚具体观名的缘故，然推测不会是常熟致道观。因姚广孝此前已游览过这座闻名遐迩的常熟第一道观，有诗纪称“琳馆无尘真福地，门前万竹自青青。丹成井底飞双鹤，桧老坛边布七星。鹤舞出林朝每见，龙吟归壑夜还听”。^④若席应珍主持过致道观，以情以理而言，作为挚友的姚广孝是不会略而不名的。

此后正德年间的《姑苏志》，也未记载席应珍领致道观，而是称其“主常熟普福宫”^⑤。普福宫位于席应珍故里双凤乡，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（1285）由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弟子、号为“清宁抱一凝妙真人”的双凤里人周静清创建。初为道院，寻改“普福观”，至大三年（1310）元武宗赐额“大玄元普福观”。观内尝产玉芝，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作《玉芝记》，又书“双凤福地”匾额，“玉芝祠”雅号遂名闻远近，成为元代平江路重要道观。延祐四年（1317）周静清蜕化，由弟子周应灵主事，“增饰观规制，更观曰宫，授葆真凝素崇道法师，袭普福宫提点”。^⑥此后是否由席应珍继主普福宫，未见于《姑苏志》外的其他文献，连《姑苏志》卷三十“普福宫”条也未有相应记载，倒是后文随称佑圣道院“旧在许浦镇，道士席应真迁于此，班惟志记”云云。^⑦故席应珍是否真的主持过普福宫，仍需考察。

①（清）朱彝尊《明诗综诗话》不分卷，《天津图书馆孤本秘籍丛书》第十六册，第774页。

②《相城小志》卷五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412号，第229页。

③嘉靖《常熟县志》卷十（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7辑，书目文献出版社，第1228页）、正德《姑苏志》卷三十（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6辑，第459页）。并参见《常熟市志》（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版）、《江苏省志·宗教志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）。

④（明）姚广孝《秋日登海虞致道观》，《逃虚子诗集》卷七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8册，第52页。

⑤正德《姑苏志》卷二十九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7辑，第925页。

⑥《双凤里志》卷四、卷五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乡镇志专辑（9），第58、77页。并参见嘉靖《太仓州志》卷十（《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》第20辑，第713页）、《太仓县志》（江苏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42页）、《江苏省志·宗教志》（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02-103页）。

⑦正德《姑苏志》卷三十，佑圣道院，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6辑，第460页。

《姑苏志》所称“班惟志记”，即前引《常熟州东李塘右（佑）圣道院之记》碑，为今徐市镇两块幸存的元代碑刻之一。该碑成于元顺帝至元四年（1338），由平江路常熟知州班惟志撰写、庆元路昌国知州徐敬篆额、杭州路仁和县尹贾策书丹。碑文详述州人徐立为安置父母原崇祀于家中的玄帝神像，在道士席君子阳（即席应珍）的建议下，将有江涛侵蚀之虞的佑圣道院迁建于常熟县东五十里之李塘地方，文称：

海虞东五十里李塘，新作佑圣道院，盖里中徐君之所迁也。初，君之父母夙昔异感，家祠玄帝惟敬。……父母既歿，君兄弟泣曰：……必严厥构以安神栖，神安即吾先人之心安矣。会许（许）江佑圣道院为江涛所啗，席君子阳因谓之曰：“君欲栖神，即迁是院，无他求也。”君喜曰：“吾志遂矣。”至顺二年三月，始迁于所居之阴式里而近，中殿以院像，设殿前后，两旁众屋，缭而周焉。凡为屋若干楹，置田若干亩。择道士有德者馆之，席君实领焉。^①

碑末署撰文时间与立碑主事姓名，为“至元四年龙集戊寅正月十有五日记，通玄明素弘道法师本院住持席应珍立石”。王汝璋《青崖集》又有《寄佑圣道院席心斋》诗，谓“五云飞构拟蓬莱，夜夜丹光照上台。月出蛟龙环剑佩，笙鸣鸾凤集楼台。玄经自写黄庭字，绿酒谁同紫玉杯。江国已成三载别，不凭青鸟一书来”。^②两相印证，可以明确席应珍最初所领道观，为李塘佑圣道院，而非致道观。《姑苏志》记席应珍主“普福宫”的说法也是错误的。其中原因，可能是元代普福宫为常熟东南重要道观，曾领席应珍出家之“乡院”或主持之佑圣道院。而普福宫又于明初“毁于兵，归并常熟致道观”^③。三者间遂形成佑圣道院—普福宫—致道观由低到高的层级关系，后人虚词誉美，遂致讹误。也可能只是席应珍在这两座重要道观中有过活动。具体缘何尚难定论，但可以肯定的是，席应珍“主普福宫”、“提点致道观”的说法均与史实有间，其最初主持者，实为李塘佑圣道院。

（四）住持苏州白鹤观与相城灵应宫

据班惟志碑记，佑圣道院在至顺二年（1331）春建成，席应珍随即受邀“实领”院事，但直到七年后也就是至元四年（1338）方由捐资人徐立请到知州班惟志撰文，经席应珍刻石为纪。其缘由，或与席应珍即将前赴郡城修葺白鹤观有关。《平江纪事》称元顺帝至元三年（1337）三月初一日，有白鹤至张应玄栖身的大松树下。一鹤留之不去，“性若灵异”，应玄遂“欲创立道观”，但不久物故，由弟子席应珍继成其事。如此，则席应珍前赴苏州，当在至元三年春季后不久。至元四年他在佑圣道院主持立石之举，或寓离别为纪之意。今暂将席应珍离开佑圣道院的时间定为至元四年（1338），往后或也不会相隔太久。

席应珍主持修建白鹤观情况，前引高德基《平江记事》记载简略。据时人所记，其经过尚有曲折，略云：

道士张应玄始庐其下，遂有群鹤自东南来，盘旋于空。久之，一鹤下峙于松弗去，经岁作巢其颠，大如斗盎。每晨长鸣，屡获奇验。张既羽化，复请括苍赵贞士知微、鄱阳萧炼师玄中，皆克修虚净玄妙之学而行之，为人所重，而公（张世昌一引者注）益礼之，俾相继主席，仍割腴田若干亩饭其徒。赵与萧状其事于朝，乞更道院为白鹤观，当宁可之，请降玺书护焉，由是白鹤观之名著于吴中矣。未几公捐馆舍，赵与萧亦以次委蜕。张弟子席应真博通玄典，兼读儒书，踵构馆宇，轮奐一新。仍即观东为祠堂，以祀公及清河伯以下凡几主。

①（清）顾崇善纂《里睦小志》卷下，又（民国）程心龛辑《里睦小志艺文志补》。《常熟乡镇旧志集成》，第643页、第667页。该碑原在徐市镇布厂内，图片见《徐市镇志》书前彩页，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。

②（明）朱存理《珊瑚木难》卷六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子部第815册，第203页。

③《双凤里志》卷二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乡镇志专辑（9），第27页。

每遇讳日节序，用玄教荐享之。^①

可知白鹤观之名，乃是在张应玄故后，因大檀越张世昌捐献观田，由主院道士赵知微、萧玄中等请于当局，遂将报恩道院更名白鹤观。“著于吴中”，而非在席应珍修建完工之后方得，《平江记事》所记有误。张应玄于复建白鹤观有首倡之功，但羽化后继主其事者，先有括苍赵知微、鄱阳萧玄中两位道士。因赵、萧两人“亦以次委蜕”，席应珍不得不前来继主其事，将活动重点移至苏州。张世昌于相城私第去世，时在至元三年六月十四日，^②赵、萧委蜕亦相距不远。故席应珍主持白鹤观修建，当在元顺帝至元三年（1337）后不太久，并“踵构馆宇，轮奐一新”，又在观东建立张世昌祠堂，岁时祭荐。席应珍随出任住持之职，直到晚年迁主相城灵应宫。

席应珍何时从苏州白鹤观迁至相城灵应宫，未见记载。姚广孝称他“惟灵应一坐二十余稔，兵后能中兴其业，人咸誉之也”。张昶相沿其说，称席应珍“居相城灵应宫，一坐二十余年，兵后能中兴其业”。姚广孝所记虽为概说，但以两人的亲密关系，相对可信。从席应珍辞世的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上推 20 年，为至正二十一年（1361），时席应珍恰年迈周甲，与“老归”之说相契，可将此约略视为席应珍从白鹤观迁往灵应宫的时间。

（五）席应珍之修为

《明史》等文献的记载，将席应珍塑造为擅长兵法与术数之学的奇异道士，并不准确。据姚广孝所撰墓志，其事迹突出者，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：

一是治学方面，席应珍好学不苟，博通三教，成就斐然。姚广孝在墓铭中说到“先生性端诚，好学不苟，略于真经秘篆、醮章丹法，靡不洞究，兼读儒者书，于《易》尤邃，至于释氏之法，术家之小道，悉能通焉。”祭文中，姚广孝也提到席应珍“究群经之秘篆，将游心于太始。……然其迹之不朽，乃有得乎众理。虽百氏之该贯，妙释部与儒经”，强调席应珍兼收众长的治学路径。^③后世著述因而或说席应珍“兼读儒书，尤邃于《易》，至于释典方术之道，悉能通焉”^④。或强调他“真经秘篆，靡不洞晓。兼读儒书，于《易》尤邃”^⑤。都体现了席应珍三教兼通的特点。

席应珍与文学之士常有诗酬往来。他前往苏州白鹤观担任住持，友人赋诗为贺，其一云：“阖闾城东日宝观，道纪堂前席炼师。芝草满山都是药，琅玕绕屋遍题诗。乾坤一粒空中黍，岁月千年石上棋。枣大如瓜还未熟，明朝我欲访安期。”^⑥退居灵应观期间，又有文友致诗云“昔曾避乱久相依，今日重来却似归。客意欲随春北去，雁声犹带雪南飞。已多中国栖荆棘，不独阳山死蕨薇。倘向赤松方外住，愿陪鹤从莫相违。”^⑦席应珍也具有较好的文学才华，为明代羽士之翹楚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收明代擅诗道士 6 人，席应珍列于其中，辑录其诗四首，清末顾嗣立等编选《元诗选》时亦予收入。其《周玄初来鹤诗》称：

琼佩朝元礼玉坛，散花天女集云端。仙人骢马纷前导，上帝旌幢俨下观。

黍米珠悬光烨烨，桂花香冷露漙漙。空歌奏彻琅风细，一一飞鸣献顶丹。

①（元）佚名《白鹤观张伯颜祠堂记》，《相城小志》卷六。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 412 号，第 276 页。据正德《姑苏志》卷二十九，作者为郑元祐。

②（元）佚名《张伯颜圻志》，《相城小志》卷六。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 412 号，第 277 页。

③（明）姚广孝《祭海虞席先生文》，《逃虚类稿》卷四。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 28 册，第 134 页。

④（明）张昶《吴中人物志》卷十一。《四库存目丛书史部》第 97 册，第 771 页。

⑤（清）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闰集。前引第 675 页。

⑥（明）王汝璋《送席心斋住白鹤观二首》之二，（明）朱存理《珊瑚木难》卷六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子部第 815 册，第 203 页。

⑦（明）陈文度《二月八日重游灵应奉简席炼师》，（明）朱存理《珊瑚木难》卷六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子部第 815 册，第 203-204 页。

《题章复画碧桃》云：

忆昔瑶池侍宴时，碧桃花下酒盈卮。今朝醉里看图画，羞对东风两鬓丝。^①

方志还记载，席应珍撰有《金薤稿》一卷，又有志于史乘，曾撰《姑苏志参》，可惜均已亡佚^②。但从上述流传下来的极少数作品，已可证席应珍的文学成就，并窥其博通文史之概。此外，席应珍擅于书法，前引题《秋林渔隐图》墨迹可为佐证，友人诗中亦称“喜见新诗俱小楷，眼明必定尚加餐”云^③。

其二是为人处世方面，席应珍诚孝于母，协于宗戚，堪为称道。对此，姚广孝在墓志中谓席应珍孝敬母亲，侍奉周到，祭祀时每“痛泣若新丧”，他人以出家为劝，席应珍则以“吾法当割爱入道，然世间岂有不孝之神仙也哉？！”因此得到众人交口赞誉，“咸可其言”。此说为《姑苏志》、《吴中人物志》等相沿称之。席应珍以孝行誉于一时，可能是受到道教支派净明道的影响。南宋绍兴年间（1131—1162），周（何）真公在江西南昌西山创传净明道，虽一度后继乏人，但由许逊崇拜发展而来的净明忠孝信仰，则始终流传未绝。尤其是经南宋末年刘玉（1257—1308）的复兴与重建，“忠孝”成为南方净明道支派修持的基础和根本，在道教内部产生了很大影响。^④以“忠孝净明”著称的净明道流传到姑苏地区，“主张儒释道三教融合，其教义宗旨大略以忠孝廉慎、调养心性为基，内炼修养为本，外行符水炼度为用”，元以后逐渐归于正一派，但影响持续相传。^⑤姚广孝称席应珍于“真经秘篆、醮章丹法，靡不洞究”，在祭奠文中又提到他“究群经之秘篆，将游心于太始。特啸风以鞭霆，每驱神而役鬼”^⑥。方志也称席应珍“契妙道，施符水，传天书”^⑦。友人诗中则说其“青简风雷行秘籙，紫绡云雾出仙衣”。^⑧可见席应珍可能是一位习事符篆的正一道士，但孝母之行无疑大有净明道遗风。刘玉弟子黄元吉（1270—1324）就说过“当知九霄之上，岂有不净不明不忠不孝的神仙也？”^⑨与席应珍“吾法当割爱入道，然世间岂有不孝之神仙也哉”的说法若相呼应。这在元后期的姑苏道教内并非孤例，出生于天历二年（1329）的高道周玄真，“虽身寓方外，事母林（氏）至孝”，为人称道^⑩。

席应珍以温敬友爱之道待人，与乡党宗戚形成了融洽和谐的关系。姚广孝在墓志中称赞席应珍“友于兄弟，睦于宗戚，和于乡党。接物之际，温温如春风袭人，故髯丈韶童皆知敬爱。”在祭文中，姚广孝则提到“故缙绅之从游，特眷眷而多情”，强调席应珍与缙绅交游中所受到的尊

①（清）钱谦益《列朝诗集》闰集第一，中华书局2007年版第十一册，第6175—6176页。又见（清）顾嗣立、席世臣编《元诗选》癸集，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1372—1373页。钱谦益辑明代善诗羽士6人，为张宇初（62首）、席应珍（4首）、余善（6首）、卢大雅（4首）、周思得（3首）、邓羽（2首）。

②《相城小志》卷六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412号，第261页。又（清）时宝臣纂《双凤里志》卷五，《中国地方志集成》乡镇志专辑（9），第66页。《相城小志》又载席应珍撰有《列朝诗集》，与钱谦益所编同名，疑误，所指或即《列朝诗集》所收席应珍的四首诗。

③（明）陈文度《得席炼师诗一首》，（明）朱存理《珊瑚木难》卷六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子部第815册，第204页。

④参见卿希泰主编《中国道教史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三卷，第309—310、345—360页。

⑤《江苏省志·宗教志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96页。

⑥（明）姚广孝《祭海虞席先生文》，《逃虚类稿》卷四，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8册，第134页。

⑦（清）施何牧《灵应观建文昌阁碑记》，《相城小志》卷二，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412号，第83页。

⑧（明）王汝璋《寄席心斋》，（明）朱存理《珊瑚木难》卷六，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子部第815册，第202页。

⑨《中黄先生问答》。《道藏》第24册，文物出版社、上海书店、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页。

⑩（明）张昶《吴中人物志》卷十一。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史部第97册，第771页。

敬^①。元代中后期，有吴中道士步云洲，“事寡嫂女兄，甚友爱”。^② 席应珍“友于兄弟，睦于宗戚，和于乡党”的性格，与道内优良传统的熏陶，或也有很大关系。

综上所述，席应珍不仅博通三教，而且是一位品德高尚的有道之士。姚广孝在墓铭中赞誉席应珍“守其教而勿泥也，故能博究儒释诸家之书；割其爱而弗固也，故能奉于亲，尽生事葬祭之礼；洁其身而弗我也，故能协于兄弟宗戚乡党之情。弗泥也，弗固也，弗我也，岂非古之有道之士者欤？！”孔子一生以“勿意、勿必、勿固、勿我”之“四勿”自勉，姚广孝用儒家圣人之典类比，他对席应珍的评价是相当高的。后人过其墓，作诗颂云“丘墟寂寂临川上，桑海茫茫感蜕余。旧用枣盘灵霹雳，新来剑地入耘锄。羽人欲化枫株老，仙鹤无言石表虚。我愿追求《金薤稿》，碧苔狼藉漫蛀书。”^③ 清代康熙年间，仍有文称赞席应珍“博通渊微，旁及儒释、兵法，莫不洞晓，孝友和敬，望而知为神仙中人，……奉母终养二十余年，姚荣国铭其孝行”云。^④ 可见席应珍在当地之影响。

（六）席应珍与姚广孝的关系

姚广孝从席应珍求学之事，为明清史志记载的重点。尤其是《明史》称姚广孝“事道士席应真，得其阴阳术数之学”，更在后世产生重大影响。但对于姚广孝向席应珍求学的内容，则各书记载不一。《姑苏志》记“时相城灵应观道士席应真者，读书学道，兼通兵家言，尤深于机事，广孝从之，执弟子礼，于是尽得其学”。^⑤ 《相城记》称“席应真习道家法，兼通兵术，且具先天之数，斯道窃师之，尽得其真传”^⑥。王鏊仍之^⑦，张昶亦云“多得其传”，均称姚广孝从席应珍处得到多方面的真传。也有的仅强调兵法、术数、占候等“机密”内容。如《名山藏》称“相城道士席应真者，博学明法，兼综兵略，道衍师之，尽得其机密”。^⑧ 《明史窃》谓“道士席应真者授有兵书术家言，（姚广孝）又好之，尽得其学”。^⑨ 《罪惟录》载姚广孝“初从相城道士席应珍涉兵书术家言，攻占候”^⑩，增加“占候”之说。所载各有侧重，但谓姚广孝以席应珍为师则同。其中多有不合史事处，需略作辨析。

其一是两人交往的时间。《留青日札》载“广孝，幼名天禧，长洲人，世医。从相城道士席应珍，席通儒，多异术，（广孝）质敏，尽得其传。尝白父不愿医，愿仕以显父母。父不从。……元壬辰，遂出家，入里之妙智庵，改名道衍。”^⑪ 即姚广孝入妙智庵前已随席应珍求学。《罪惟录》相似，说姚广孝“性早慧，通儒书。初从相城道士席应珍涉兵书术家言，攻占候。一日，语父‘愿儿不乐从父为医，愿学佛法。’祝发里中妙智庵，更名道衍，字斯道。”^⑫ 同样将两人交往定在姚广孝入寺之前。如此便产生一个问题：姚广孝既已随席应珍这样的高道求学，并

①（明）姚广孝《祭海虞席先生文》，《逃虚类稿》卷四。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8册，第134页。

②（明）张昶《吴中人物志》卷十一。《四库存目丛书》史部第97册，第770页。

③（明）沈周《过席心斋道士墓》，《石田诗选》卷三，又（明）曹学佺编《石仓历代诗选》卷四百九十一，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249册第599-600页、第1394册第16页。

④（清）王时敏《灵应观建集元堂碑记》，《相城小志》卷二。而文中称“炼师沁斋席应真号紫阳子”，与文献所记席应珍的字、号有别，当属观中道士讹误相承。如明代马俸碑中谓席应珍“字子阳，号沁斋”，即属错引《姑苏志》所致。相关碑刻，载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412号，第81-85页。

⑤ 正德《姑苏志》卷五十二。《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》第27辑，第810页。

⑥（明）姚士衡《相城记序》，《相城小志》卷六。《中国方志丛书》第412号，第269页。

⑦（明）王鏊《姚广孝传》。朱大韶编《皇明名臣墓铭》，《明代传记丛刊》第58册，第61页。

⑧（明）何乔远《名山藏》，臣林记。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9页。

⑨（明）尹守衡《明史窃》卷十八。《四库禁毁书丛刊》史部第64册，第254页。

⑩（清）查继佐《罪惟录》列传十六。第四册，第2233页。

⑪（明）田艺蘅《留青日札》卷二十七。第892页。

⑫（清）查继佐《罪惟录》列传十六。第四册，第2233页。

“尽得其传”，后来为何又要弃道从佛呢？

这里的关键，是要弄清两人交往的起始时间。姚、席相交在席应珍入主相城灵应宫之后，此点文献殆无异辞。考之史事，姚广孝于十四岁入妙智庵为行童，时在至正八年（1348），四年后的至正十二年（1352）正式剃度为僧^①。而席应珍自苏州白鹤观迁主相城灵应宫，在至正二十一年（1361）前后。此时姚广孝已入寺门13年，距其正式为僧也近10年了。两人相交的具体年份虽待进一步考察，但将之定于姚广孝出家前，无疑是不成立的。

其二是关于两人交往的定位。姚广孝与席应珍相交时，席应珍年过六十，姚广孝则为27岁，两人年龄相差确实很大。但姚广孝经过10多年的寺门求学，已经具备较好的佛学修养。姚广孝又与高启、王行等著名文人也有长期切磋唱和，在文学上颇有成就。因此，从知识背景来看，年近而立的姚广孝与道士席应珍交往，并非后人所称的“拜师求学”，而是站在自己初步成熟的释、儒修养上，来吸收对方道家之长的。在《访席炼师》一诗中，姚广孝就坦率地写道：

杖锡出门天尚早，度水寻仙秋正好。……我本浮屠自有师，畴肯空同来问道。

欲将耳目广见闻，要使心胸尽倾倒。虽然未暇学长生，暂许从游上蓬岛。^②

在所撰墓志中，姚广孝也将两人关系，明确定位于“忘形友”。钱谦益《列朝诗集小传》将此改为“忘形交”，并称“道衍师事之，衍公即姚少师广孝，或云少师兵法，半是心斋所传也”。“忘形友”与“忘形交”，虽仅一字之别，旨趣却大不相同。事实上，姚广孝是常与诗友一起拜访席应珍，并切磋唱和的。“邂逅空门友，仙家得共寻。石径经履破，冰溜落溪深。云过松分影，林寒鹤避阴。何烦谢人世，心静只山林”，徐贲之诗即可见其概^③。因此，姚广孝将两人关系定位于“忘形友”，也就是释、道异形之间的友朋交接，而吝许于“师”字。后出文献称姚广孝“以师事之”，并说他曾从席应珍研习兵法、术数、占候等“机事”，其实是将席应珍对姚广孝的影响夸大了。^④

但另一方面，姚广孝也确实与席应珍建立了深厚友谊。席应珍逝后，姚广孝特撰长文祭奠，详细回忆两人长期的交往“不异道而弃予，且尔予而忘形。接邻光于旦暮，异德教以相成。愧楼烦之无似，故简寂以诤盟。既欢洽而久如，曷尝事乎割烹。喜诗简之往来，或君唱而我赓。忆昔遁于西麓，俄寻幽而独行。笑悁悁之情话，夜漏尽于三更。”又感叹自己常年奔走于外，“嗟会离之莫测，故少愉而多恨”，以致“恍传计于山中，从涕出而足顿”。^⑤在挽诗中，姚广孝更深切表达了自己对席应珍的悼念之情，其诗云：

冠佩脩脩八十秋，天风忽送返瀛洲。青牛不驾依新垞，白鹤仍巢守故丘。

看剑灯前思道论，听璫云外想仙游。禅心已久忘生灭，茗奠应无泪横流。^⑥

由此可见两者的亲密关系，亦可证后出文献之增衍与附会。

① 参见商传《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4年第3期。及拙稿《姚广孝史料一则及相关诸问题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07年第2期。

②（明）姚广孝《访席炼师》，《逃虚子诗集》卷四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8册，第36页。参见商传：《明初著名政治家姚广孝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1984年第3期。

③（明）徐贲《同衍师访席有道分韵得寻字又得无字》，《北郭集》卷四《文渊阁四库全书》集部第1230册，第584页。

④ 参见江灿腾《明初道衍的反排佛论及其净土思想》，《明清民国佛教思想史论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7页。

⑤（明）姚广孝《祭海虞席先生文》，《逃虚类稿》卷四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8册，第133-134页。

⑥（明）姚广孝《挽席道士》，《逃虚子诗集》卷七《四库存目丛书》集部第28册，第54页。

三、结 语

最后将全文考辨主要内容，简要小结如下：

席应珍（1301－1381）字心斋，号子阳子，后出文献多记为“席应真”。元江浙行省平江路常熟县双凤乡沙头（今江苏省太仓市沙溪镇）人。上三代均为贫微民人，年未冠即辞亲出家，于乡中道院师从张应玄习道，后获法号“通玄明素弘道法师”。至顺二年（1331）因倡议迁建功，受邀主持常熟李塘佑圣道院。至元三年（1337）后，继师遗志，前赴郡城姑苏扩建白鹤观宇，随主持观事。至正二十一年（1361）前后，以老归相城灵应宫，于元末兵燹后复兴观务，得时人之誉。洪武十四年（1381）三月初十日卒，享年 81 岁。席应珍在道修行逾 60 年，三任住持均有治绩。其一生行迹，可大略图示如下：

元成宗	元英宗	元文宗	元顺帝	约元顺帝	明太祖
大德五年	至治元年前	至顺二年	至元三年后不久	至正二十一年	洪武十四年
(1301)	(1321)	(1331)	(1337)	(1361)	(1381)
出生	未冠即辞亲出家	住持常熟佑圣道院	赴姑苏扩建白鹤观	迁相城灵应宫	三月初十日卒

席应珍勤奋好学，洞究道家之真经秘篆、醮章丹法，又兼贯儒、释，在多个方面都有出色表现，成为博通三教、多才多艺的道教高士。席应珍精研《易经》，于阴阳术数、兵略、占候等能旁通。又擅长文辞，诗作流传于世，亦留心史乘，有所撰述。席应珍习事符篆，同时受净明道“忠孝为本”的影响，以孝母著称于乡。温煦待人，与兄弟、宗戚、乡党均相处和谐，深得他人尊敬。席应珍治学、为人，均堪称道流楷模，为后世称道，成为元末明初江南道教的杰出代表。

席应珍与著名僧人姚广孝的交往，在席应珍晚年归老相城灵应宫之后。姚广孝出家为僧前即受其影响的说法有误，姚广孝以席应珍为师、并尽得其秘学的记载，也夸大了席应珍对姚广孝的影响。但席、姚往来交流长达 20 余年，确实结下了深厚友谊，两人乃是忘年之交的“忘形友”。席应珍博通三教的治学修为，对姚广孝产生过积极影响，席应珍也由此对中国历史进程与文化遗产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。

（责任编辑：于光）